

## 中东地区体系的转型与重构\*

刘中民\*\*

**摘要：**地区体系是指地区范围内密切联动的各行为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它主要包括地区行为体、地区格局、地区秩序等。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依附性、冲突性的特点，并使中东地区成为全球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但是，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东地区体系正处在转型与重构的深刻变化之中。从世界大国对中东的影响来看，伴随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大国力量对中东的影响已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化的方向演进。在地区格局层面，由于地区大国出现严重的战略透支，不得不相继进行战略调整，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出现了以缓和对话为表现的“和解潮”。在地区行为主体层面，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明显增强，针对俄乌冲突，中东国家基于自身国家利益做出理性选择，采取了相对中立的立场和政策，力求在美俄之间进行平衡。在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方面，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板块，中东国家是“全球南方”国家进行政治、安全和发展合作的关键力量和重要伙伴。

**关键词：**中东 地区体系 多极化 地区和解 战略自主

---

\* 本文为202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国际体系与中东地区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2JJD810023）和2023年度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当代中东国家对外关系史研究”（项目编号：2023114005）的阶段性成果。

\*\*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 引论：概念界定与问题的提出

地区研究是国际问题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当前国内方兴未艾的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建设探讨的重点领域。但是，在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中，除对地区一体化及其思想支撑的地区主义研究相对较为充分外，尚远未建立地区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系，亦即缺乏超越于具体地区如中东、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非洲之上的抽象的、形而上学层次的地区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系。<sup>①</sup> 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是学界从宏观上讨论国际关系体系结构、力量对比、规范规则的主要概念，同样的，地区体系、地区格局、地区秩序也成为学界讨论地区国际关系的宏观概念。但是，正如学界对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概念缺乏共识一样，学界对地区体系、地区格局、地区秩序概念的理解同样存在分歧，甚至其研究还远远弱于对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研究。

本文之所以选择“地区体系”的概念讨论中东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体系相对于格局和秩序更具全面性和系统性，乃至包含了格局和秩序的内容。本文认为，地区体系是指地区范围内密切联动的各行为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地区体系主要包括地区行为体、地区格局、地区秩序等。

首先，从行为体层面看，地区体系是由国家、非国家行为主体组成的整体。但地区体系在行为体层面的复杂性在于它既包含地区内的行为主体，也包括地区外的行为主体，特别是世界大国和超级大国在地区事务中甚至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其次，从地区格局层面看，地区体系是活动于地区内的主要力量对比形成的权力结构。但地区格局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取决于地区内的力量对比，还取决于影响地区事务的域外力量特

---

<sup>①</sup> 在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把“地区”作为超越于具体地区之上的研究单元进行理论研究的成果可谓凤毛麟角，仅有少数论文主张关注地区政治，强调“到地区体系和地区内的互动关系之中去考察和研究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参见王学玉《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36—53页。

别是大国力量的对比。最后，从地区秩序层面看，地区体系是基于正式和非正式的地区规范、规则和惯例等形成的秩序。与地区行为体、地区格局一样，地区秩序的安排同样受到国际秩序的制约和影响，特别是主导国际秩序的大国的影响。

总之，地区事务“发生在一个由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关联维度构成的脉络之中，与全球变化、地区建设以及国家发展密不可分。相对于全球体系，地区体系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和多孔化的，全球体系、其他地区体系以及域外的国家与力量都会对特定的地区施加重要的影响”。<sup>①</sup>从全球、地区和国家三大国际关系层面看，地区具有显著的中间性、外部性特点，中间性突出表现在地区是全球和国家之间的中观空间；外部性突出表现在地区行为体结构、地区格局和地区秩序均深受全球体系、其他地区体系以及域外的国家与力量的影响。

从世界历史演进的进程来看，特别是15世纪以来伴随地理大发现、资产阶级革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扩张，即世界从分散走向整体的过程中，西方作为主导现代世界历史的主体，建构了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sup>②</sup>也正是在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众多相对独立的政治和文明单元被卷入世界体系之中。伴随西方与东方之间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形成，近东、中东、远东等具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的地区概念也得以形成。由此可见，“中东”作为政治地理概念，其术语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近东”概念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入“中东”概念而鲜有使用，“远东”概念也已伴随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非殖民化进程的完成而基本销声匿迹，但“中东”的概念作为一个政治和地理的概念却依然在广泛使用，从中也足见西方对中东地区的影响之深。

西方对中东的影响突出体现为近代以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领域对中东的干预、控

---

① 王学玉：《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42页。

② 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罗荣渠、庞卓恒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制、侵略和渗透，使得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体系具有外部强加的典型特征，导致中东国家的现代化举步维艰，使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点。在地区国际关系层面，由于西方长期采取分而治之、军事干预、代理人战争等政策对中东事务进行干预，地区各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领土边界矛盾、地缘政治矛盾、民族宗教纷争异常复杂，酿成了层出不穷的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进而使中东地区体系呈现典型的冲突性特征。

总之，中东地区体系具有典型的依附性、冲突性的特点，导致中东国家严重依赖外部特别是西方大国，进而使其发展缺乏自主性。而外部干预和内部矛盾引发的长期冲突使地区发展缺乏和平的环境和地区合作机制，形成了安全与发展之间的长期恶性互动，进而使中东地区成为全球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外部性和冲突性特征构成了掣肘中东地区行为体结构、地区格局、地区秩序进步的重要体系性因素。在行为体结构层面，由于西方大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作用，中东国家的地区主体作用受到严重限制。在地区格局层面，一方面中东地区存在域外大国支配、影响和控制地区大国的双层权力结构，另一方面域外大国通过操控领土边界、地缘政治、民族宗教等矛盾挑起地区大国对抗，使中东地区格局缺乏自主性和平衡性。在地区秩序层面，受依附性和冲突性地区体系的影响，中东地区长期缺乏公平合理的地区秩序和有效的地区机制，中东事务如地区和平进程、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发展议程等均深受欧美大国的影响，并长期被民主、人权、反恐等西方设置的议题所主导。

长期以来，在依附性和冲突性地区体系的影响下，对抗思维、安全困境、零和博弈构成了中东地区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进而使中东国家缺乏互信，严重制约了中东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地区国际合作和经济一体化。<sup>①</sup>但是，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尽管中东地区体系的依附性和冲突性特征尚未得到彻底改变，但伴随国际体系内大国力量格局变化，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影响力趋于多元

---

<sup>①</sup> 刘中民：《中国促成沙伊和解 推动中东和平发展新潮流》，《光明日报》，2023年4月5日，第4版。

平衡，地区国家的自主性上升，导致中东地区体系正呈现出值得肯定的积极变化。<sup>①</sup>

从世界大国对中东的影响来看，伴随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并把战略重心转向与俄罗斯、与中国的大国博弈，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俄的大国战略博弈加剧，双方影响中东的战略能力和意愿均受到俄乌冲突的限制，并进一步推动影响中东的域外大国力量向多元平衡的方向发展。在地区格局层面，地区大国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长期的对抗和博弈中出现严重的战略透支，促使其纷纷进行战略调整，使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出现了以缓和对话为表现的“和解潮”。在地区行为主体层面，中东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明显增强，其突出表现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应对全球层面的俄乌冲突和地区层面的巴以冲突。因此，当前的中东地区体系正处在转型与重构的深刻变化之中。

## 一 影响中东的域外大国力量：从美国独霸走向多元平衡

从冷战结束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域外大国对中东地区体系的影响与美国单极独霸的国际体系具有同构性，即美国是中东事务的绝对主导者。但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影响已经发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变化，其典型特点是从美国独霸中东向多极化趋势转变。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转向重视大国竞争，<sup>②</sup>并为此从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而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对中东的影响力则不断上升。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由于美俄围绕乌克兰的战略博弈加剧，双方影响中东的战略能力和意愿均受到俄乌冲突的限制，并将进一步推动影响中东的域外大国力量向多元平衡的方向发展。

---

① 刘中民：《重构中的中东地区格局：迎来和平发展“新气象”？》，《世界知识》，2022年第18期，第14页。

② Shelly Ulbertson et al., *Renewing U.S. Security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RAND Corporation, 2022, p. x.

### (一) 美国影响中东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下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深刻认识到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泥潭对美国国力的削弱,以及国际权力转移对美国的挑战。<sup>①</sup>因此,美国全球战略开始逐步从中东反恐转向应对大国战略竞争,并寻求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这是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一以贯之的战略调整,尽管其具体做法存在明显差异。在美国寻求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之际,中东却爆发了持续十余年之久的“阿拉伯之春”。中东历史巨变需要美国加大战略投入的客观态势与美国寻求从中东战略收缩的主观意愿之间的矛盾张力,对美国的中东战略构成了巨大挑战,也使美国对中东的影响力不断下降。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战略收缩”作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已基本成形,其内容主要包括:减少军事手段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比重,淡化中东战略的军事霸权色彩,极力避免造成重大伤亡的军事行动;注重美国中东外交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增加美国中东战略的经贸、技术成分和非传统安全要素;推动、实现中东地区各盟友之间的合作,促成地区盟友在美国中东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sup>②</sup>为此,奥巴马政府在中东政策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其基本方向是以对话和接触为主要手段维和促稳、解决两伊问题,其主要内容是从伊拉克撤军、与伊朗对话、启动和平进程、修复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其中心目标是重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形象。<sup>③</sup>但是,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并不成功,除在伊核问题上取得并不圆满的伊核协议外,美国的中东政策收效甚微。美国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从伊拉克撤军,是导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崛起的重要原因;美国在“阿拉伯之春”后就如何影响地区国家转型问题上犹豫不定,并与

---

① Richard N. Haass and Martin S. Indyk, eds., *Restoring the Balance: A Middle East Strategy for the Next President*,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该书是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萨班研究中心(Saban Cente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专家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其主旨是全面总结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教训。

② 张帆:《超越地区霸权?——试析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转型》,《美国研究》,2021年第5期,第38页。

③ 唐志超、刘权:《奥巴马政府中东政策初析》,《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7期,第33页。

俄罗斯借叙利亚危机重返中东形成强烈反差；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下文简称“沙特”）、以色列等传统盟友的关系也发生严重倒退。

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核心是在继续进行战略收缩、减少投入的情况下，通过遏制伊朗整合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日渐疏远的盟友关系，重点强化美国与沙特和以色列的盟友关系，使沙以两国在遏制伊朗、反恐等领域承担更多任务和成本，进而增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sup>①</sup> 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重点主要包括：退出伊核协议，策动地区国家全面对抗伊朗；强化与以色列的盟友关系，通过推动“世纪协议”实现以色列与“温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组建以沙特为中心的反伊朗联盟即“阿拉伯版北约”，极力维护美沙同盟关系；通过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发动有限军事打击进行军事威慑。总之，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一方面延续了“奥巴马主义”指导下的战略收缩与离岸平衡方略，另一方面则在“美国优先”的话语背景下呈现较强的单边主义和实利主义特征。<sup>②</sup>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除继续减少对中东战略投入这一政策相对明确外，并无宏大的中东战略，其中东政策主要是为减少中东对美战略掣肘而进行的政策调整，如启动重返伊核协议的维也纳谈判，为也门内战等热点问题降温，减少和压缩对沙特、阿联酋等盟友的军事支持，重提解决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以及不计后果地从阿富汗进行灾难性的撤军等。<sup>③</sup> 但是，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反映出美国中东战略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国为把主要战略资源转向大国战略竞争而减少对中东的战略投入；另一方面，美俄围绕俄乌冲突的战略博弈又需要中东国家特别是能源生产国配合对俄进行制裁，而中东国家特别是其盟友国家由于对美国的信心下降转向在大国之间进行战略平衡。中东国家在俄乌冲突中的反应，便是这种大国平衡政策的反映。

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凸显了美国中东政策的狭隘性和功利

- 
- ① 刘中民：《中东的 2018：对抗、僵持、失衡》，《光明日报》，2018 年 12 月 16 日，第 8 版。
  - ② 刘辰、马晓霖：《延续与调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 年第 5 期，第 46 页。
  - ③ 董漫远：《拜登政府中东政策调整与中东形势新特征》，《当代世界》，2022 年第 5 期，第 45—46 页。

性。除了重提“两国方案”外，拜登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与特朗普政府并无明显区别。<sup>①</sup> 在转向战略收缩的过程中，美国面对的新议题、新挑战不断增多，其中东政策更加狭隘、功利，对解决巴以问题既缺乏足够的动力，也失却应有的公正，导致巴以问题不断被边缘化。新一轮巴以冲突迫使美国调整其外交政策的注意力，美国不得不同时面对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两场危机。美国原本希望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减少对该地区的资源投放，但目前仍然紧张恶化的形势促使美国重新投入更多资源。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新一轮巴以冲突再度强化了美国严重偏袒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形象，降低了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可信度。从本质上看，美国在中东地区权威下降，“首要原因不在于自身绝对硬实力的萎缩，而更多是由于缺乏可预测的政策方向以及可信的政治承诺”。<sup>②</sup>

## (二) 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受到俄乌冲突的限制和削弱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严重下降。但自普京执政以来，特别是在“阿拉伯之春”之后，俄罗斯重返中东的步伐加快，对中东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利用中东事务制衡美西方的能力增强。首先，俄罗斯成为叙利亚危机的主导者，其借助打击“伊斯兰国”之机军事介入叙利亚，既维护了自身在叙利亚的利益，也阻遏了美国和西方在中东进行政权更迭的惯用做法。其次，俄罗斯与土耳其、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建立的合作机制，不仅对叙利亚国内事务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成为俄、土、伊三国平衡西方的重要平台。最后，俄罗斯与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的大批中东国家在能源、经贸、安全、军购、反恐等领域的密切合作，成为俄撬动中东国家与西方关系的重要杠杆，如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400导弹防御系统扰乱了美、土、俄三方本就缺乏互信的平衡关系。<sup>③</sup>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大多数中东国家采取中立立场，虽不支持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强调维护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但也不愿意“选边站队”

- 
- ① 刘中民：《国际与地区格局演进中的巴以问题》，《思想理论战线》，2024年第1期，第107页。
  - ② 余纲正：《新型“中间地带”：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71页。
  - ③ 刘中民：《重构中的中东地区格局：迎来和平发展“新气象”？》，《世界知识》，2022年第18期，第14页。

并参与西方发起的对俄制裁，充分显示了俄罗斯近年来经营中东的显著成效。<sup>①</sup> 俄乌冲突已持续两年之久，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双边关系并未受到严重冲击。沙特、伊朗、阿联酋、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卡塔尔和以色列等地区主要国家表示愿在地缘政治、经济、技术、能源等领域与俄罗斯继续开展合作。<sup>②</sup> 但是，受俄乌冲突的影响，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无疑将受到削弱和限制。首先，俄罗斯的国家战略资源受到俄乌冲突限制，无法在中东进行更多投入；其次，由于西方制裁以及美国不断加大对中东国家施压力度，俄罗斯与中东国家的经贸、能源、军事等合作将面临诸多障碍；最后，尽管中东地区国家不愿“选边站队”，但美国的中东盟友国家无疑将承受美国对其施加的更大压力，其在与俄罗斯合作时无疑将更加谨慎。

### （三）中国在中东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不断增强

在政治上，中国同时与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以色列保持友好合作，与十多个中东国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在经济上，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与中东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多领域进行务实合作。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国尊重中东国家的道路和制度选择，尊重中东的文明多样性，积极与中东国家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开展多领域“民心相通”交流合作，成为文明互鉴的典范。在安全领域，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以发展促安全的中国理念，积极在维和、反恐、反海盗等领域维护中东安全。在热点问题上，中国坚持公平正义，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推动中东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sup>③</sup>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开始忌惮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上升，并对中东国家施加压力，其做法主要包括：向中东国家施加压力，为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一带一路”合作制造障碍；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

---

① Simeon Kerr et al., “Gulf States’ Neutrality on Ukraine Reflects Deeper Tie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28,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5e3b0998-705f-46c4-8010-9972b3c8a847>.

② 唐志超：《外溢与突围：乌克兰危机升级对中东的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5期，第74页。

③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范鹏等《中国热点外交的理论与案例研究——以中东热点问题为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

的问题上，要求中东国家配合美西方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是，中东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对华政策并未受到美国施压的影响，相关国家不仅坚定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的核心利益，而且不断加强与中国的全方位务实合作。在中美关系日趋紧张的当下，中东国家都希望保持与双方的合作关系。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中东后，沙特外交国务大臣阿德尔·朱拜尔（Adel al-Jubeir）表示，沙特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并不相互排斥，并将继续加强与中美两国的关系。<sup>①</sup>

2022年底，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的召开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2023年3月，中国、沙特和伊朗三方发表标志着沙伊和解的联合声明，中国为中东地区“和解潮”的出现发挥了重要的建设作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国倡议举行的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和中方提出的“立场文件”，得到了参会的20多个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中国之所以能够促成沙伊和解并为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缓和注入新的动力，并没有外界和舆论猜测的灵丹妙药，其内在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与中东各方相互尊重、守望相助，构成了中国赢得中东国家信任的深厚基础。新时代以来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编织全球伙伴关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等外交理念和实践，特别是近两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更与长期饱受战乱威胁、民族冲突、宗教争端、文明隔阂困扰的中东人民的需求高度契合。中国成功斡旋沙伊和解和建设性推动巴以双方尽快重启和谈，不仅带动海湾和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缓和，而且正在改变长期以冲突、对抗为特征的地区政治格局和战略文化，使中国长期推动的和平发展、协商对话、包容互鉴等理念和实践成为地区国家的共同选择，并有望使缓和与发展成为持续深化的地区潮流。<sup>②</sup>

在美俄对中东影响力相对下降、中国对中东建设性作用增强的同

---

① 余纲正：《新型“中间地带”：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74页。

② 刘中民：《中国促成沙伊和解 推动中东和平发展新潮流》，《光明日报》，2023年4月5日，第4版。

时，其他新兴大国如印度等对中东事务的参与也明显增强。<sup>①</sup> 总之，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日趋多元平衡，有助于改变少数大国通过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主导中东地区体系的状况，更有助于增强中东地区国家的自主性。但是，由于美国仍需要中东地区特别是美国的盟国配合其与俄罗斯、中国进行大国战略竞争，美国在从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的同时又存在突出的矛盾心态，担心俄、中填补美国撤出后出现的所谓权力真空，进而导致美国在中东“失势”。<sup>②</sup>

## 二 中东地区国际关系：从对抗冲突走向缓和对话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冲突对抗、零和博弈构成了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特别是地区大国关系的核心特征，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呈现阵营化、意识形态化、代理人化等典型的身份政治特征，形成了民族、教派等矛盾相交织的集团对抗局面，其主要矛盾包括以沙特和伊朗为中心的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对抗，<sup>③</sup> 土耳其领导的“亲穆斯林兄弟会阵营”与沙特主导的“反穆斯林兄弟会阵营”的对抗。<sup>④</sup> 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危机、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土耳其与沙特围绕支持和反对穆斯林兄弟会（下文简称“穆兄会”）的长期博弈，地区大国在也门、伊拉克、叙利亚的代理人博弈，都是地区大国对抗的集中体现。

近两年来，伴随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大国并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中东地区大国在“阿拉伯之春”以来面临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特别是俄乌冲突以来美俄的战略博弈重点从中东转向乌克兰，促使地区国家纷纷进行战略调整。在此背景下，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出现了罕见的“和解

① 相关的讨论可参见魏亮《浅析印度莫迪政府的中东政策》，《学术探索》，2020年第11期。

② 参见 Becca Wasser et al., *Crossroads of Competition: China,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RAND Corporation, 2022。

③ Daniel Byman, “Sectarianism Afflicts the New Middle East”,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 Vol. 56, No. 1, 2014, p. 80.

④ 刘中民、赵跃晨：《“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第41—67页。

潮”。自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和伊朗三方发表联合声明后，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土耳其与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的关系都出现了对话、缓和的积极互动。同时，巴以冲突再起主要会对美国推动的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产生一定的迟滞作用，但对中东地区“和解潮”的影响有限。

### （一）沙特阵营与伊朗阵营从对抗走向缓和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分别以沙特、伊朗两大地区强国为核心形成的阵营化对抗构成了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格局的重要特点。<sup>①</sup>双方的主要矛盾包括民族矛盾、教派矛盾、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以及双方在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代理人战争或竞争，但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是双方矛盾的核心。

沙特和伊朗的对抗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至冷战结束，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是伊朗输出革命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抵制革命的矛盾、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立和两伊战争都与此密切相关。第二阶段，2003年伊拉克战争至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双方的主要矛盾是伊拉克战后重建、伊朗核问题。沙特、约旦等阿拉伯逊尼派国家提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高度警惕伊拉克战争后伊朗崛起的势头，“伊朗拥核”成为沙特最大的战略焦虑。第三阶段为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集中表现为沙特与伊朗双方围绕阿拉伯国家转型，以及双方在地区热点问题如巴林问题、也门问题、叙利亚问题上的矛盾；而2015年萨勒曼就任沙特国王后的冒进外交，以及伊核协议的签署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加剧了沙特对伊朗政策的对抗性。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事件和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事件导致双方的对抗阵营化、教派化、代理人化，<sup>②</sup>特别是双方在巴

① Shaul Bakhash, *Reign of Ayatollah: Iran and the Islamic Revolution*, Basic Books, 1984, p. 232.

② 刘中民：《中东地区格局的冷战化趋势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18年第2期，第14—15页。

林、叙利亚、也门展开了激烈的代理人竞争。<sup>①</sup>

2021年以来，均在内政外交上陷入战略透支的沙伊双方出现关系缓和迹象。2021年4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公开表达了对伊朗的善意，表示愿意与伊朗克服导致地区分裂的分歧，共同促进地区和平。此后，沙特与伊朗展开了频繁的互动，并不断释放缓和关系的善意。在整个2021年，伊朗与沙特在伊拉克举行了四轮双边会谈，就缓和海湾地区紧张局势达成了初步共识。但沙特与伊朗的对话始终未能取得突破。2022年底以来，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沙伊双方最终在北京实现和解。因此，尽管沙特和伊朗有改善关系的内生动力，但中国无疑为双方复交发挥关键作用，这也是中国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沙特与伊朗和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直接带动了伊朗、叙利亚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缓和，各方改善关系的步伐在不断加快。<sup>②</sup>

首先，伊朗与沙特关系的改善不仅有助于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还带动了伊朗与整个阿拉伯世界关系的缓和。2021年8月，沙特和伊朗两国外长共同出席了由伊拉克主办的巴格达峰会，这是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以来双方少见的高层接触；2021年12月，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塔赫农·本·扎耶德（Tahnoun bin Zayed）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伊朗；2022年，科威特和阿联酋相继与伊朗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伊朗总统莱希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成功实现互访。2023年3月沙特与伊朗在北京实现和解后，沙伊双方为恢复外交关系频繁互动，伊朗与海湾国家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关系缓和的步伐也不断加快，受沙特和伊朗影响的也门内战等热点问题也明显降温。

其次，伊朗与沙特关系的缓和有利于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关系的缓解。2017年6月5日，沙特领导阿联酋、巴林、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一起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实施制裁，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卡塔尔

---

① 陈翔、申亚娟：《伊朗介入中东地区事务的动力及限度》，《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1期，第44—50页。

② 刘中民：《中国促成沙伊和解 推动中东和平发展新潮流》，《光明日报》，2023年4月5日，第4版。

与伊朗关系暧昧引起了沙特的强烈不满。2021年初,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四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恢复邦交;同年11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访问包括卡塔尔在内的五个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2022年卡塔爾世界杯期间,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等国高层互动频繁,海湾阿拉伯国家展现出团结姿态。<sup>①</sup>

最后,伊朗与沙特关系的缓和还有利于阿拉伯国家重建和改善与叙利亚的关系。由于伊朗和沙特在叙利亚问题上分别支持巴沙尔政权和其反对派,伊朗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盟友关系直接构成了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反对巴沙尔政权的原因之一。伊朗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反过来也有利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关系的缓和。2021年以来,约旦、埃及、阿联酋、沙特等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改善了关系;在2023年3月沙特与伊朗复交后,阿拉伯国家联盟已于同年5月恢复叙利亚的成员资格,这显然与沙特与伊朗关系的缓和有重要关系。

## (二) “亲穆兄会阵营”和“反穆兄会阵营”关系全面缓和

伴随中东变局的演进,中东国家围绕影响阿拉伯国家内部转型的穆兄会等伊斯兰主义力量,形成了亲伊斯兰主义和反伊斯兰主义的竞争乃至对抗,这也是阿拉伯国家转型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过程中,以埃及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不仅成为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重要因素,而且成为中东地区力量争夺地区领导权的工具。

自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穆兄会在埃及的发展经历大起大落。总体而言,从2011年2月到2012年6月,穆兄会通过选举政治迅速崛起并掌握权力;从2012年6月到2013年8月,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对立加剧,最终导致军方废黜穆尔西,并在此后把穆兄会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进行打压。在埃及穆兄会发展大起大落的过程中,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不同考虑,沙特、阿联酋对穆兄会持反对立场,并支持埃及塞西政府对其进行镇压和打击;土耳其和卡塔尔则支持穆兄会,并因此

---

<sup>①</sup> 孙德刚、章捷莹:《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地区格局的演进》,《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2期,第34页。

与埃及塞西政府和沙特龃龉不断；围绕穆兄会的对峙也成为土耳其与沙特矛盾对抗的重要领域。<sup>①</sup>由此可见，在中东变局中，中东地区形成了以土耳其为中心的“亲穆兄会阵营”和以沙特为中心的“反穆兄会阵营”。这两个阵营的复杂矛盾斗争还构成了2017年6月沙特与卡塔尔断交的深层次原因，沙特提出的复交条件之一便是卡塔尔必须中止对穆兄会等“恐怖组织”的支持。

沙特等海湾国家反对穆兄会既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政治考虑。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发展模式的角度看，沙特反对穆兄会的原因在于避免现代伊斯兰主义力量成为中东地区的主导力量，因其在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方面对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挑战。从现实的角度看，穆兄会力量不断在转型阿拉伯国家扩张的潜在影响，对于沙特政权无疑更具挑战性和不确定性。如果在世俗的军政权和穆兄会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沙特显然倾向于地区影响较小的军方力量，而不是拥有巨大地区影响和不确定性的穆兄会。

沙特对埃及军方废黜穆尔西和清洗穆兄会予以积极支持，而土耳其则选择支持穆兄会，并对埃及军方的行为表示强烈反对。土耳其选择支持穆兄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及的自由与正义党同属温和的伊斯兰政党，二者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土耳其力图通过支持转型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政党，扩大正义与发展党新版“土耳其模式”的地区影响，提升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土耳其对穆兄会的政策引起了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强烈不满。“阿拉伯国家认为埃尔多安、正义与发展党和穆兄会分享了相同的政治方案，而穆兄会被沙特、阿联酋和埃及认定为恐怖组织。这导致这三个国家——尤其是阿联酋和埃及——指责土耳其支持一场被它们视为本国和地区安全威胁的政治运动。”<sup>②</sup>

总之，沙特与土耳其围绕埃及穆兄会的沉浮存在着尖锐的意识形态

---

①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赵跃晨《“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② Stephen J. Flanagan et al., *Turkey's Nationalist Course: Implications for the U. S. -Turkish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the U. S. Army*, RAND Corporation, p. 70.

和现实利益的矛盾,它们围绕穆兄会进行的复杂博弈也聚焦了传统伊斯兰与现代伊斯兰矛盾、地区大国矛盾等,并与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矛盾相交织,进而深刻影响了中东地区格局的调整重组,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形势的动荡。

2021年以来,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的关系开始缓和。2021年,沙特国王萨勒曼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两次通电话,土耳其与埃及为实现关系正常化举行两次“探索性会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应邀访问阿联酋,以上互动都是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关系缓和的具体表现。<sup>①</sup>在2022年,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关系缓和的步伐明显加快。2022年2月和4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分别访问阿联酋和沙特,6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在访问过程中,土耳其与沙特、阿联酋分别签署多项合作协议。<sup>②</sup>伴随土耳其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关系回暖,土耳其与埃及关系也迅速改善,双方已于2023年3月恢复了中断十年的大使级外交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sup>③</sup>

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关系的缓和有利于缓解地区国家围绕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所进行的争夺,也有利于缓和海湾合作委员会内部的矛盾,同时更有助于地区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与土耳其的发展合作。<sup>④</sup>双方关系缓和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双方的核心矛盾即亲穆兄会阵营和反穆兄会阵营的矛盾得到释放并趋于消解。第二,伴随美国中东战略收缩和地区国家转型发展压力加剧,地区国家均在进行适应性调整,各方均出现对外寻求缓和、对内谋求发展的变化。第三,双方围绕卡舒吉事件的矛盾最终得到解决。2022年4月土耳其法院裁定将卡舒吉案中26名被告的法律诉讼程序移交给沙特司法系统,令此案转变为沙特国内的司法案件,进而拆除了引发双方关系矛盾的引信。第四,

- 
- ① 刘中民:《2021年中东地区形势》,载余泳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21—2022)》,时事出版社,2022年,第32页。
  - ② 金良祥:《中东国家新一轮关系缓和探析》,《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6期,第142页。
  - ③ 孙德刚、章捷莹:《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地区格局的演进》,《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2期,第32页。
  - ④ 刘中民:《2021年中东地区形势》,载余泳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2021—2022)》,时事出版社,2022年,第33页。

双方都在进行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缓和关系成为双方的共同诉求。<sup>①</sup>

### （三）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关系趋缓

首先，以色列与土耳其关系趋于缓和。在冷战时期，土耳其是最早承认以色列并与其建交的伊斯兰国家；伴随阿以冲突爆发，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因巴勒斯坦问题出现摩擦，但双方并无严重的冲突。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双方还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同盟关系。但随着 2000 年以后中东和平进程受阻、巴以多次爆发冲突，特别是 2002 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后土耳其外交回归中东，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急转直下，双方在巴以问题、库尔德问题两个彼此关切的核心问题上相互攻击，在几乎所有中东热点问题上摩擦、冲突不断。在 2010 年 5 月发生的“蓝色马尔马拉”（Mavi Marmara）号事件（即以色列国防军与土耳其救援加沙的船只发生冲突，导致人员伤亡的事件）后，双方不仅在外交舆论上相互攻击，而且彼此撤回驻对方国家的大使达六年之久。2016 年以后，土耳其与以色列实现形式上的和解，双方的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仍然龃龉不断。2018 年 5 月，以色列和土耳其再度因巴以在加沙的暴力冲突陷入危机，双方再次召回驻对方国家的大使。进入 2022 年，受地区国际关系缓和以及各自内外战略调整的驱动，以色列与土耳其的关系出现明显改善。2022 年 3 月，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时隔 14 年后访问土耳其；9 月，埃尔多安与时任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闭门会晤。<sup>②</sup> 土耳其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的立场相对平衡，并正在寻求发挥斡旋和调停作用。因此，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受到巴以冲突的严重影响。

其次，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出现波折，但整体趋势并未改变。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巴勒斯坦问题的产生导致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长期对抗。但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以来，随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阿拉伯世界内部分化加剧，阿以冲突逐步向巴以冲突转变。随着中东和平进程的启动，美国不断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sup>①</sup> 刘中民：《土耳其与沙特“一笑泯恩仇”？》，《新民晚报》，2022 年 6 月 30 日，第 15 版。

<sup>②</sup> 孙德刚、章捷莹：《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地区格局的演进》，《和平与发展》，2023 年第 2 期，第 32 页。

埃及、约旦分别于1979和1994年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2000年以来,中东和平进程受阻,巴勒斯坦问题不断被边缘化,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集体合作的意愿下降,为美国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采取明显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并通过《亚伯拉罕协议》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2020年9月15日,以色列、阿联酋、巴林三方在美国白宫签署《亚伯拉罕协议》,2021年摩洛哥、苏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进而使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四个阿拉伯国家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2022年3月,以色列首次作为东道主邀请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埃及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外长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六方决定成立“内盖夫论坛”,致力于推动务实合作。同年6月,六国高级外交官齐聚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了该论坛的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sup>①</sup> 2022年以来,以色列高层领导人还频繁造访阿联酋、阿曼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新一轮巴以冲突打乱了美国拜登政府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建交的战略布局,相关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谈判被迫暂停,不得不通过“制衡战略”和“对冲战略”实现各种力量的相互制衡。事实上,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态度比较割裂,它们对以色列的谴责措辞有所区别,其原因在于个别国家仍抱着与以色列改善关系以获得现实利益的心态。如果以色列愿意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巴勒斯坦建国,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将会再次打开。

### 三 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增强: 基于自身利益 应对俄乌冲突

俄乌冲突不仅对国际体系、世界秩序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也对全球各大地缘板块和政治力量的重组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原因在于俄乌冲突并非俄乌双方的简单冲突,其背后还有俄美欧之间的复杂角力和博弈,特别是美国力图通过俄乌冲突巩固、调整和重组其

---

<sup>①</sup> 《以色列内阁批准成立“内盖夫论坛”推动与阿拉伯国家合作》,光明网,2022年9月19日, [https://world.gmw.cn/2022-09/19/content\\_36033599.htm](https://world.gmw.cn/2022-09/19/content_36033599.htm)。

全球盟友体系，进而使俄乌冲突成为修复和延续美国霸权的特殊平台。但从世界各国对美俄围绕俄乌冲突的博弈来看，除欧洲和亚太传统意义上的美国盟友外，中东、中亚、南亚等地区的美国盟友并未唯美国马首是瞻，更没有围绕美俄“选边站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西方力量相对衰落世界政治中的反映。

就俄乌冲突对中东的影响来看，俄乌冲突并未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相反，中东地区国际关系还少有地出现了日益自主发展的气象，中东国家对美俄围绕俄乌冲突的博弈总体上保持中立<sup>①</sup>，并未“选边站队”。这无疑与美、俄、欧传统力量对中东影响更趋衰落，特别是美国为转向大国竞争而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密切相关。中东国家对美俄围绕俄乌冲突的博弈总体上保持中立，力求在美俄之间进行平衡，并根据自身利益进行政策选择，甚至敢于拒绝美国的要求，其实质是域外大国力量对中东的影响力日趋平衡，中东国家的战略自主不断增强的体现。

### （一）阿拉伯国家对俄乌冲突的反应

在俄乌冲突之初，阿拉伯国家对俄乌冲突的反应特别是对俄罗斯立场，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头小中间大”，即强烈支持和强烈反对俄罗斯的国家都是凤毛麟角，而绝大多数国家尽管表面上反应不同，但实际上持中立的立场。强烈支持俄罗斯的国家只有近年来得到俄大力支持和保护的叙利亚，强烈反对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的只有科威特，但这两个国家的影响力都十分有限。

伴随俄乌冲突的演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作为美国盟友的沙特、阿联酋等承受的来自美国的压力增大，其中既有美国要求其参与对抗和制裁俄罗斯的直接压力，也有美国要求其在能源领域配合对俄制裁的压力。但是，阿拉伯国家乃至美国盟友并未出现“一边倒”加入美对俄制裁的

---

① 关于中东国家对俄乌冲突的反应可参见章远《俄乌冲突与伊朗维持中东地区均势的对外行为》，《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42—57页；余纲正《新型“中间地带”：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58—76页；杨晨《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77—94页；吴诗尧《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举措及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95—116页。

情况，在美俄之间保持平衡成为阿拉伯国家政策选择的主要特征，甚至有些国家敢于从自身利益出发与美国进行博弈，这突出表现为沙特、阿联酋拒绝美国的石油增产要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多次要求沙特大量增产石油以抑制全球油价的快速上涨，但沙特始终表示应坚持遵循与俄罗斯等主要产油国先前达成的产量协定。<sup>①</sup>

总之，在应对俄乌冲突的过程中，阿拉伯国家采取了避免追随冲突中任何一方的中立政策，其特征主要有二：第一，阿拉伯国家同时加强了与各方的互动，与相关国家就不同议题进行合作以实现战略对冲；第二，阿拉伯国家加强区域内部协商互助，避免外来风险冲击与扩散，同时增加集体优势。<sup>②</sup>这与冷战时期和冷战后阿拉伯国家或追随美国或追随苏联（俄罗斯）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

## （二）土耳其对俄乌冲突的反应

在俄乌冲突中，土耳其基于自身国家利益和身份，采取了在俄乌之间、俄美之间、俄欧之间进行平衡的政策。土耳其作为拥有北约成员国身份的美国盟友，基本上是完全根据自身的利益展开外交攻势。包括对俄乌的高调外交斡旋，在俄乌、美俄之间保持平衡，在芬兰、瑞典加入北约问题上设置障碍，要求西方满足土耳其在库尔德等问题上的利益，都是其外交自主和国家利益导向的体现。

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及黑海沿岸国家，土耳其在俄乌之间、俄美（北约）之间及俄欧之间实施平衡外交政策，极大提升了土耳其在美、俄、欧博弈中的战略自主地位。土耳其利用危机在各方之间积极开展斡旋，特别是在粮食运输、黑海航道安全等问题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彰显了其作为欧亚地区大国的影响力。土耳其采取平衡外交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基于对俄乌冲突复杂历史原因认知的结果，是基于平衡国内派系林立的政治力量、谋求战略自主地位的选择，也是土耳其

---

① 余纲正：《新型“中间地带”：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66页。

② 余纲正：《新型“中间地带”：俄乌冲突中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70页。

自身多元复杂身份的产物。<sup>①</sup>

### （三）伊朗对俄乌冲突的反应

伊朗当前最大的诉求之一是恢复伊核协议，以摆脱制裁并缓解日趋严峻的经济困境，但俄乌冲突显然已对伊核协议谈判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其核心症结是美国不断变脸，一方面强调把由乌克兰问题引发的对俄罗斯制裁与伊核问题脱钩，但另一方面又以种种借口拖延伊核谈判。由于共同受西方严厉制裁，俄乌冲突促使俄伊关系有向联盟化方向发展的势头。

在俄乌冲突中，伊朗不仅未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相反进一步加强了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伊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金融、能源、交通等领域合作不断增强，双方签署了价值约400亿美元的能源合作协议，并且还在商谈签署长期合作协议。2022年7月普京出访伊朗，凸显了俄罗斯对伊朗的重视程度。<sup>②</sup>

### （四）以色列对俄乌冲突的反应

以色列对俄乌冲突的反应异常谨慎。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以色列对俄乌冲突进行了居中调停，但不得罪冲突双方、维护自身利益构成了其政策的主基调。对于俄罗斯，以色列的措辞谨慎，避免直接指责和批评俄罗斯，迟迟不肯参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严厉制裁，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场合在明确反对俄罗斯的同时做出明显保留。针对乌克兰，以色列向乌克兰提供了丰富的人道主义援助，但严正拒绝后者的进攻性武器援助请求。以色列在不同外交场合对乌克兰局势表示担忧，并尽可能满足乌克兰方面的政治支持诉求。<sup>③</sup>

基于美以特殊关系的考虑，在俄乌之间、俄美之间，以色列尽管在立场上有向乌克兰、美国方面倾斜的一面，但在总体上采取中立立场，

- 
- ① 杨晨：《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77—94页。
  - ② 唐志超：《外溢与突围：乌克兰危机升级对中东的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5期，第75页。
  - ③ 参见吴诗尧《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举措及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107—109页。

力求避免得罪双方特别是避免刺激俄罗斯,其根本考虑在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以色列有许多重要利益需要通过和俄罗斯保持合作加以保障,尤其在涉及以色列安全利益的伊核问题、叙利亚问题上,以色列需要和俄罗斯保持协调。<sup>①</sup>同时,两国的经贸、能源、安全合作也十分密切。以色列在乌克兰则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乌克兰是以色列重要贸易伙伴和科技合作伙伴。此外,为维护散居犹太人的安全,以色列需要和俄乌双方进行协调。乌克兰是全球犹太人主要聚居国之一,其境内共有20万~40万犹太人,大多聚居在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城市。<sup>②</sup>为了保护散居犹太人的安全,以色列政府在对俄乌冲突进行调停的过程中,多次就保护乌克兰犹太社团的安全与俄罗斯进行沟通、协调。当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美国和西方的巨大压力下,以色列后来不得不对其政策进行一定调整,如加入西方对俄制裁的行列、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装备等。<sup>③</sup>

总之,俄乌冲突以来,在美国发起对俄谴责、围堵、制裁的过程中,中东国家的反应和政策选择尽管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基本上采取了相对中立的立场和政策,并未加入美国制裁和对抗俄罗斯的阵营,尤其是土耳其、沙特、阿联酋、以色列等美国盟国,并未简单按照美国要求行事,而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进行理性选择,这一切都是中东国家战略自主性增强的体现。

## 四 中东地区体系转型与重构面临的挑战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东地区体

- 
- ① 例如,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明确指出,反对重启伊核协议是其调停俄乌冲突的利益考量之一;调停俄乌冲突有利于以色列在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朗的势力。参见“Bennett: My Mediation Helped, But I'm Wrapped in Israel's Flags, Not Ukraine's”, *The Times of Israel*, April 11, 2022,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iveblog\\_entry/bennett-my-mediation-helped-but-im-wrapped-in-israels-flag-not-ukraines/](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iveblog_entry/bennett-my-mediation-helped-but-im-wrapped-in-israels-flag-not-ukraines/)。
- ② Arnold Dashefsky and Ira M. Shekin, eds.,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2020*, Springer Publishing, 2022, p. 290.
- ③ 参见吴诗尧《以色列介入俄乌冲突的动机、举措及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5期,第110页。

系正处在转型与重构的深刻变化之中。从世界大国对中东的影响来看，伴随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大国力量对中东的影响已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化的方向演进。在地区格局层面，地区大国出现严重的战略透支，促使其纷纷进行战略调整，使中东地区国际关系出现了缓和对话的“和解潮”。在地区行为主体层面，追求发展转型成为大多数中东国家的自主选择。针对俄乌冲突，中东国家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进行理性选择，采取了相对中立的立场和政策，力求在美俄之间进行平衡，这是中东国家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的集中体现。

总之，在经历长期的动荡和冲突之后，中东地区体系在大国关系、地区格局、地区国家地位等层面都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中东地区体系转型与重构的趋势在持续深化。但是，中东地区体系重构仍存在着诸多隐忧。

### （一）美国对中东格局的破坏性作用依然十分突出

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到当前的拜登政府，尽管美国历届政府的中东政策各不相同，但在中东寻求战略收缩是其共同取向。在此过程中，美国不仅战略投入下降，而且政策更加功利，多采取要求地区盟国承担更多义务、拼凑对抗伊朗的地区同盟等政策，并借沙特与伊朗对抗、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以及地区冲突等谋求巨大的军售利益。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难以满足地区盟国的利益诉求，更难以维系地区主要力量的平衡，其战略能力、战略意志和战略信誉都出现严重下降，导致其在中东的领导地位发生松动。尽管美国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但其不断挑拨地区国家对抗伊朗、拼凑军事同盟体系、不计后果地从阿富汗撤军等做法，对中东地区体系重构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为加强同俄罗斯、中国的战略博弈，不断向中东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地区国家“选边站队”，进而使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影响力呈现多极化与大国博弈加剧并存的复杂态势。美国战略重心更多转向大国博弈，并不意味着长期放弃中东。当前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存在着进退失据的战略犹豫，但美国战略界围绕中东的战略重要性仍存在广泛共识。2022年兰德公司的报告仍建言美国政府要继续保持中东的战略优先地位，但要改变中东政策的手段，特别

是减少军事手段的运用。<sup>①</sup> 因此,从长期角度看,美国仍将把中东作为其战略优先方向。

## (二) 地区国际关系缓和仍较为脆弱

首先,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尖锐,沙特与伊朗关系缓和仍存在诸多障碍,地区大国围绕叙利亚内战、也门危机、利比亚冲突、伊拉克重建等中东热点问题仍存在深刻矛盾,这一切都对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缓和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其次,中东地区大国关系缓和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还是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尚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沙特、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改善,有一定的内生动力,主要是各大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面临一系列困难,进而试图通过缓和与地区大国的关系减轻压力,但这种动力的作用很难突破对抗性的地区格局的制约。基于历史和现实形成的中东地区矛盾和外部干预盘根错节,当前地区大国缓和关系虽有内生动力,但更多是针对美国中东战略的适应性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新一轮巴以冲突正是美国巴勒斯坦政策发生严重倒退的体现。此轮冲突无疑将中断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而沙特和伊朗的和解进程也会受到制约。

最后,国际格局变动为中东地区创造的机遇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也将影响中东地区的“和解潮”是否能够持久。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的双双下降为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创造了机遇,而俄乌冲突导致低迷十多年的石油价格暴涨,沙特等海湾国家更是通过巨额石油收入增强了战略自信。总之,中东地区的缓和潮流之所以能够出现,与国际格局变动特别是俄乌冲突为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创造的政治和经济机遇密切相关。因此,国际格局变动能否持续对中东地区利好,构成了影响中东地区和解潮流能否持续的重要外部因素。

## (三) 中东地区国家转型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中东地区国家发展严重不平衡。中东国家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差异,多数国家尚存在政局不稳、军人干政、教俗矛盾、

---

<sup>①</sup> Shelly Culbertson et al., *Renewing U.S. Security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RAND Corporation, 2022.

族群与教派冲突、经济危机、民生困难、外部干预等多种消极因素，使得中东国家的发展转型依然任重而道远。

其次，身份政治的困境掣肘中东地区国家的转型。一方面，中东民族国家的构建深受超国家和次国家认同的困扰，这两类身份政治博弈下的中东民族国家建设屡遭挫折。另一方面，作为民族国家构建基础的世俗民族主义又受到泛伊斯兰主义等伊斯兰思潮的冲击，甚至发生矛盾冲突。总之，基于身份政治的困境长期影响着中东民族国家的构建，同时由于民族、宗教、教派的身份认同具有跨国性，其带来的矛盾不断外溢以致影响地区国家间关系，甚至酿成国际冲突。

#### （四）俄乌冲突的冲击和挑战

俄乌冲突的爆发和延宕，特别是其对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的冲击，使中东国家既面临着重要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首先，能源价格上升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能源价格上升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不同，对能源生产国近期的财政收入乃至国际地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对其长期的经济多元化转型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国际油气价格不断上涨，这固然有助于增加沙特等海湾国家的油气收入，改善其财政状况，同时提升其在全球能源格局乃至世界经济中的地位，<sup>①</sup>但是，油价上涨对海湾阿拉伯国家推进“后石油时代”发展愿景等长期发展战略，无疑会造成一定消极影响。众所周知，海湾国家经济转型的动力是俄乌冲突前十年间油价持续下跌、传统石油经济陷入困境。因此，俄乌冲突带来的油气价格上涨无疑在一定时期内会减轻海湾国家的财政压力，进而削弱其推进经济多元化转型的动力。从更大范围来看，油价上涨给多数中东非能源生产国带来的则是更大的压力和经济困境。一方面，油价上涨使中东非能源生产国的负担更加沉重，使其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更加窘迫；另一方面，能源价格上升引致的运输成本上升，又会导致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企，进而加剧粮食危机。

---

<sup>①</sup> 唐志超：《外溢与突围：乌克兰危机升级对中东的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5期，第70页。

其次,粮食危机风险陡增考验转型国家的治理能力,爆发第三波“阿拉伯之春”的风险上升。2022年3月11日的一份报告显示,整个阿拉伯世界对俄乌两国小麦的进口依赖程度超过50%,其中对俄罗斯小麦的进口依赖程度为34.4%,对乌克兰小麦的进口依赖程度为15.9%。俄乌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世界的粮食安全顿时成为一个紧迫问题。<sup>①</sup>曾经因取消食品补贴和通货膨胀爆发“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国家,特别是受到前两波“阿拉伯之春”冲击的埃及、突尼斯、也门、叙利亚、苏丹、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以及经济困境不断加剧的伊朗,都有因粮食危机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的风险。2022年以来新一轮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已在中东多国引发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导致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sup>②</sup>总之,“阿拉伯之春”以来中东地区国家的转型困难与世界经济不振相叠加,使多数中东国家面临严峻的发展困境,而俄乌冲突所加剧的能源和粮食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国家特别是转型阿拉伯国家的经济社会危机,并推高其政治风险。

## 余 论

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持续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其根源在于中东和平进程陷入停滞以来长期累积的复杂矛盾。此次巴以冲突在冲突方式、伤亡规模、危机程度等方面均打破了巴以关系的僵持模式,并对中东地区体系的转型与重构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尽管巴以冲突十分惨烈并有所外溢,但由此引发第六次中东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中东地区的“和解潮”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并不会因巴以冲突的影响而破裂。

首先,从世界大国影响来看,新一轮巴以冲突迫使美国重新介入中东,但并未改变大国力量对中东影响的多极化趋势。新一轮巴以冲突爆

---

① 韩小锋:《粮食危机可能成为阿拉伯世界社会稳定失序的导火索》,《中国青年报》,2022年4月8日, [https://m.cyol.com/gb/articles/2022-04/08/content\\_OXBRRuW5M.html](https://m.cyol.com/gb/articles/2022-04/08/content_OXBRRuW5M.html)。

② 唐志超:《外溢与突围:乌克兰危机升级对中东的影响》,《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5期,第68页。

发以来，拜登政府向以色列提供了军事、政治、外交和财政等全方位支持，包括向中东派出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增加部署“萨德”与“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向以色列提供大批武器弹药，打击反以武装等。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强调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不应有私利，只有共同责任，主张在“两国方案”和联合国相关决议的基础上实现阿以两大民族和平共处。

其次，从地区格局演变来看，新一轮巴以冲突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但并未改变中东国际关系出现的“和解潮”趋势。本轮巴以冲突在红海方向、黎巴嫩方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方向的外溢和不断升级，极大地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伊朗与以色列的矛盾均有所上升。但除伊朗与以色列长期对抗外，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不会走向彻底破裂，而伊朗尽管与以色列、美国的对抗在不断加剧，冲突的风险不断上升，但不大可能直接参与巴以冲突。总之，巴以冲突外溢失控的可能性不大，不致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

最后，从地区行为主体来看，新一轮巴以冲突影响中东国家战略布局，但并未改变中东国家增强战略自主性的总体趋势。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中东各国成为域外大国争夺的对象。然而，中东国家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从本国利益和外交理念出发制定政策，推动中东冲突降温降级。此轮冲突让中东国家进一步看到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进一步认清美国的双标和虚伪，从而更加坚定了走独立自主和地区合作道路的信念。尽管巴以冲突持续延宕，但随着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正成为中东国家的新气象，中东国家不愿意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而是希望扮演“第三种力量”，独立自主、和平发展正成为中东的新气象。

（责任编辑：赵跃晨）

## Abstracts

###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System

*LIU Zhongmin*

The regional system refers to an organic whole 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and mutual influence of closely linked actors in the region according to certain rules, which mainly includes regional actors, regional pattern and regional order. For a long time,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system ha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ependence and conflict, which made it become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the most serious security deficit, development deficit and governance deficit in the world.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system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in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since the “Arab Spring” happened in 2011,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fluence of great power on the Middle East, with the strategic contraction of the U.S., the influence of great powers on the Middle East has evolved from unipolar hegemony to multi-polar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patter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have seen a “reconciliation wave” in the form of easing dialogue due to the serious overdraft of regional powers. For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actors, the strategic autonomy of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In response to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have made rational choices based on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adopted relatively neutral positions, and sought to balance between the U.S. and Russia.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fluenc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lobal South”, the Middle East countries are key forces and important partners for the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to engage in politic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Keywords:** Middle East, Regional System, Multi-polarization, Regional Reconciliation, Strategic Autonomy

##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 Foreign Relation

*ZHAO Yueche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s foreign relations is essentially a “puzzle” job, which is to establish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fragments. Based on Chinese and English academic achievements of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s foreign relations, this article takes evaluates them from three aspects: ideology, core policies and main relations, trying to uncover the “strange” and “mysterious” veil on the road of Saudi Arabia's rise. Contemporary Saudi Arabia's foreign relations show great flexibility, but also face great challenges, which are embodied in how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 between domestic interests, security needs and global strategy.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state system determine that the evolution of Saudi Arabia's foreign relations is not short of contradictions. In the future, the compatibility of Saudi Arabia's foreign relations thought, the coordination of foreign relation policies, and the strategic aspects of foreign relations interaction are worthy of in-depth observation.

**Keywords:** Saudi Arabia, Foreign Relation, Foreign Policy, The Middle East, Islam